

武漢新聞史料

第五輯

長江日報新聞研究室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地区的新闻事业

- 湖北财经学院 袁继成 刘继增 毛 磊 (1)
- 关于《革命军日报》.....罗伯先 (25)
-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武汉报刊拾零.....陈辉汉 (27)
- 唐大悲不是共产党员.....张宣沅 (36)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武汉新闻界的斗争

- 童式一 杨家文 秦 敢 万 林 (41)
- 解放前从事武汉新闻界地下斗争的回忆.....胡盛田 (59)
- 汉口联合征信所与《征信新闻》.....陈梦浓 (68)
- 华中经济通讯社始末.....童式一 (74)
- 《工商时报》创刊经过.....李凌飞 (82)
- 关于《大华晚报》汉口版.....舒名世 (84)
- 我所了解的《正风报》.....商若冰 (86)

- 汉口《和平日报》点滴……………又 然(91)
- 记者生活……………吕建中(94)
- 校对生涯……………陈 七(106)
- 纪念陈仰平……………闻 尧(110)
- 哭弟诗……………陈 頌(114)
- 史料一则……………张克明(116)
- 有关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的某些补正……………章绍嗣(118)
- 武汉新闻事业(转载)……………管雪霁(120)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武汉地区的新闻事业

湖北财经大学 袁继成

一、新闻事业的发展

新闻报刊是重要的舆论工具。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已认识到，报刊是“无声之金鼓，诛奸之妙器”^①。强调“以提倡革命，非借报馆为喉舌不可。”^②在改组国民党、倡导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时，孙中山又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号召“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③他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必须唤起民众。”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更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党的“二大”以后，出版了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一些报刊。许多共产党人以公开和隐蔽的身份办报办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四大”专门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随后又发出第二十二号通告，明确指出：“我们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方坚决的去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英勇的斗争，但是一方尤应努力的作普遍和深入的盛大宣传工作”，“惟有扩大我们的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群众来参加我们的斗争。”^④在这些精神的指导下，国民政府在广州时期便创办了《广州民国日报》、《政治周报》、《人民周报》等一批革命报

刊。北伐军光复武汉、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武汉不仅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也是全国的新闻宣传中心。

北伐军进入武汉前，武汉虽有董必武以郭炯堂名义主办的《楚光日报》、钱介磐（亦石）主办的《武汉星期评论》、湖北省临时农民协会办的《湖北农民》，湖北省妇女协会办的《湖北妇女》等革命报刊，多数报刊却是商业性的，有的更以黄色宣传取胜。为了控制武汉新闻界，吴佩孚、萧耀南除自办御用报刊外，还用种种手段笼络和收买武汉的报界人士。时人揭露，武汉的一些“报馆通信社，遍设于烟馆妓院之内”⑤。“吴佩孚部下参议、谘议等虚职，汉口报界的新闻记者恐怕要占三分之二，各报记者狂嫖滥赌，买马票，又麻将、讨姨太、购婢女，也无不是吴佩孚、萧耀南、陈嘉谟的津贴。⑥”北伐军进入武汉后，一些军阀的御用报人逃之夭夭，他们所办的报刊随即关闭。一些商办的黄色小报，慑于革命气势，纷纷停刊。继续出版的报刊中，不乏诋毁、攻击革命的言论。正象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机关报《汉声周报》分析的那样：“各报的一千元一千五百元的津贴无形的取消。平日一切挥霍的费用，无人接济。这种痛苦明明是革命军给的。……所以他们将报纸张数减少，将重要消息搁置，压抑革命的宣传，并于字里行间隐以攻击国民政府的形迹。⑦”

针对这种情况，北伐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邓演达、郭沫若为了“扩充革命的认识和革命的气势”，“开始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指北伐军总政治部——笔者）的检阅才能够发行。⑧”他们颁布的新闻检查条例

规定：“凡报馆及通讯社，如有发表违背党义、及不利于革命之记载，而拒绝检查者，除将该报馆及通信社即行封禁外，所有负责人员，一律以军律惩办。⑨”经过这种大刀阔斧似的整顿，武汉地区新闻事业的面貌逐渐改观。有关当局还在整顿的基础上，公布了诸如《新闻电报章程》等一些制度和原则，俾以宣传革命思想和国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

在整顿原有报刊的同时，各种革命报刊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迎来了新闻事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党、政、军、工、农、青、妇、商、学等机关、团体创办的各类报刊，骤然勃兴，竞相问世。除《楚光日报》、《武汉星期评论》、《湖北农民》、《湖北妇女》外，新涌现的革命报纸有《汉口民国日报》、《革命军日报》、《中央日报》、《工人日报》、《农工日报》、《武汉民报》、《血花世界日报》等。革命刊物有《群众》、《汉声周报》、《工人导报》、《湖北政府公报》、《一周时事述评》、《革命生活》日刊……等。1926年底，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相继迁汉。1927年“四·一二”和“四·一五”反革命事变以后，国民党中央各部的刊物如《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商民运动周刊》……等也移汉出版。各机关团体还创办了《血光通信社》、《人民通信社》、《农工通信社》、《劳工通信社》、《川汉通信社》等。武汉的新闻宣传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据统计，从1926年9月到1927年7月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地区有各种报纸三十余种，刊物六十余种，通信社十余家，超过上海、广州，而与北京大体相等。

为了切实指导武汉地区的新闻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汉办公后，决定每周召开一次宣传会议，“出席者中央省市党报编辑各一人，总政治部一人，中央省市宣传部各一人，汇报编辑一人，外交部代表一人，由邓演达同志任主席，鲍顾问（指苏联顾问鲍罗廷——笔者）、孙科同志列席指导。”⑩定期讨论和布置宣传要点，使新闻宣传事业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帝反封建政策服务。中国共产党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以及中共湖北区委的负责人，通过在各个革命报刊、通信社主持工作的董必武、钱介磐、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潘汉年、杨贤江、谢远定、曾钟圣、陆更夫等共产党员，把党的意图和主张即时地反映出来，动员各阶层人民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7年春天，以《汉口民国日报》为首，武汉的一些报刊和通信社发起组织“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公推《汉口民国日报》总编辑宛希俨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负责起草“记联”章程。3月20日，“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在汉口的中央人民俱乐部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正式成立。参加的单位有《汉口民国日报》、汉口《中央日报》、《楚光日报》、《革命军日报》、《江声日报》、《汉口商报》、《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报》、《大陆日报》、《新民报》、《鄂报》、《黄报》、《血花世界日报》、人民通信社、血光通信社，以及《上海新闻报》、《上海商报》、天津国闻通信社等外地驻汉新闻单位，共有正式会员一百零五人。“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武汉地区的新闻记者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使自己“成为大多数痛苦民众的喉舌，而形成一种左右政治左右社会的舆论权威”，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①成立会选出陈启修(中央日报)、宛希俨(汉口民国日报)、邹碧痕(汉口商报)、邓瘦秋(人民通信社)、秦君侠(楚光日报)、王民仆(公论报)、喻的痴(上海新闻报)、邵季昂(人民通信社)、凤竹荪(汉口新闻报)等九人为武汉“记联”的执行委员,王子林(大陆日报)、罗普存(江声日报)、黄达权(楚光日报)等三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武汉“记联”的成立,有助于团结武汉新闻界,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集合多数人的力量和意见,统一宣传策略,改良新闻技术,增进舆论权威”②。“记联”成立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汉口民国日报》为首的武汉新闻界,一致通过了《质问蒋介石摧残革命舆论》和《肃清新闻界反动分子》决议。《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上海总工会的长篇报告《蒋介石屠杀上海革命工人记实》,《中央日报》副刊刊载了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的蒋介石》。各报刊、通讯社大张鞞伐,掀起了一个声讨蒋介石的高潮,有力地配合了武汉地区的讨蒋运动。武汉“记联”还出面发起召开全国新闻记者联合会,准备把全国新闻界团结起来,共同讨伐蒋介石,把反帝反封建革命进行到底。

1927年5月中旬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军事上的进攻、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些报刊甚至认为已处于“四面楚歌、满城风雨、叠卵可危时候。”③原来想借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力量、以武汉为基地,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枢权力的汪精卫,把前不久说过的“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走开去!”④豪言壮语扔到一边,迅速地向右滑去。他把革命遇到的一些挫折和困难,归咎于共产党的活动

以及工农运动的发展。武汉国民党中央6月2日召开的中央及湘鄂赣三省党部党报联席会议上，汪精卫、陈公博竭力指责所谓“偏重工农运动而忽视工商业者之错误”^⑮，为他们限制与镇压工农运动的行为辩护。这次会议，从始至终贯彻了他们“纠偏”工农运动的精神，是他们阴谋利用新闻宣传事业制造“分共”舆论、蓄谋叛变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的一些革命报刊被封闭或被夺权，许多比较进步的商办报刊也受到打击。

革命在全局上败阵了，兴盛一时的武汉新闻宣传事业顿时凋零。但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在提高群众觉悟、壮大革命声势、推动革命发展方面的贡献，仍是不可磨灭的。一些革命者正是在这时的革命舆论的启迪和指引下，分清了敌我，明确了方向，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边，又投入了新的战斗。由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新闻界参预掀起的民族民主运动潮流，是那样地深入人心，对以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一部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宣传事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它还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党领导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培养了一批既有革命思想、又懂新闻业务的专门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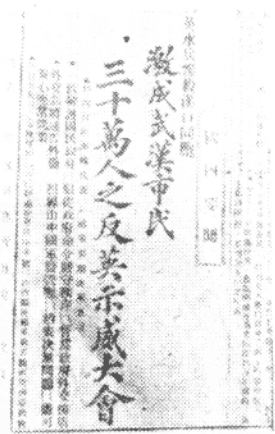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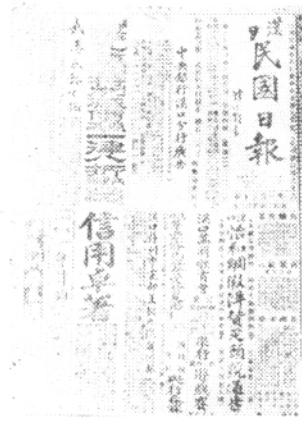
二、主要的革命报纸刊物

汉口民国日报 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后，董用威（必武）为首的国民党湖北省、汉口特别市党部即与总政治部着手筹办“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唯一言论机关”^⑯——《汉

口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0日，利用已被封闭的李振（华堂）的反动报纸《国民新报》的汉口歆生路忠信二里四号社址和印刷工具，《汉口民国日报》正式发刊^{①7}。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汉后，一度由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省、市党部合办^{①8}。1927年3月，才明确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报社的经理为董用威，总编辑先后为宛希俨（1926年11月—1927年3月）、高语罕（1927年3—4月）、沈雁冰（1927年4月底—7月），主要编辑为石信

嘉、马念一（哲民）、孙际旦、李达可等，是由共产党人公开领导的以国共统一战线面貌出现的大型日报。

报纸最初为每日对开三大张，1927年元旦后改为五大张，其中新闻六版、广告四版。沈雁冰任总编辑后，从5月份开始，另附不定期的副刊一大张。报纸的新闻部分，刊有新闻照片，这是武汉报界的创举。这样一份大型日报，只有编辑人员十余人，印刷人员十余人。报纸排好后，总编辑、编辑都要参加校



对。但报纸仍办的有声有色，在宣传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政策，支持工农群众运动，揭露帝国主义、新老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罪行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该报联系湖北及武汉地区党、政、军、工、农、青、妇、商、学各界，在上海、北京、广州、南昌、福州、莫斯科、日内瓦、伦敦、巴黎、纽约都聘有特约通讯员，联系面广，综合性强，比较全面、忠实地反映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备受国内读者的欢迎，国外的联系和影响也很大。原来发行四千多份，以后增至一万余份，仍供不应求。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后公开叛变革命。董用威于18日辞去《汉口民国日报》经理职务，报纸编辑部被迫改组。汪精卫先后派杨绵仲、曾集熙接管了报纸，使其成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喉舌，直到9月30日报纸在新军阀斗争中停刊。综计《汉口民国日报》共出版了三百零六期，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至今仍是研究武汉国民政府历史的宝贵资料。

中央日报 为武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该报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汉后即开始筹备，1927年3月22日正式出版。武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余兼社长，陈启修（时为共产党员）任主撰，孙伏园为副刊主撰。编辑杨绵仲、王盛炯、周天根、宋一鸷，英文编辑许孝炎、王鸣文。社址在汉口交通路生成里四号。该报分中英文两版，中文正刊四中张，副刊一中张，英文一大张。该报在出版广告中宣称，它“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报，职在作本党之喉舌，指示国民革命之理论与实际，以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实行国民革命；同时并欲提倡文学美术趣味，使中国全国文化程度，能

随革命潮流之高涨而提高。^{①9}”报纸初创刊时，还有一些革命气息，如最早在副刊上发表郭沫若的《请看今日的蒋介石》一文，对人们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推动当时的反蒋斗争，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随着汪精卫集团逐渐向右转，报纸办得越来越没有生气。回答反动派对湖南农民运动攻击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一文，它拒绝刊载^{②0}。它也“拒绝登载那些反蒋的‘过火’的新闻和言论，说是留着将来见面的余地。^{②1}”有人批评该报“对于其所负的任务，简直没有完成其万分之一。^{②2}”以致有人指斥其身作为共产党人的主撰陈启修是“顾孟余的走狗，是投降了国民党的，所以他的心是黑的。^{②3}”

楚光日报 是董用威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郭炯堂的名义，于1926年3月24日创办的。从组织上讲，当时属于地下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但领导人则全是共产党人，实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最早公开出版的一份报纸。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躲过反动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并不一般去宣扬革命、宣传共产，而是慎重而巧妙地选择新闻和消息，通过各种专栏，向广大读者介绍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广州国民政府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大事，让身处军阀淫威下的读者开阔眼界，明辨是非。它还经常反映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描绘工人、农民、公教人员的苦难和要求。当反动军阀用“复验红契”和“盐斤加价”一类手段来搜刮劳动人民时，它断然发表了题为《再论复验红契与民间疾苦》的社论，公开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号召人民起而斗争^{②4}。虽然因此而遭迫害，一度被迫停刊。但在社会各界的声援和力争下，仍得继续出版。

武汉三镇光复后，《楚光日报》先是国民党“中央党部

所直辖之报纸”，后才明确为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②。原来的主编是宛希俨，宛调往《汉口民国日报》后，先后由秦君侠、彭兴道继任。编辑有贵达权、刘尚新、钟梦侠、李芳园、符世梁、宛哲知。社址先在汉口洪益巷，后移至铭新街锦春里二号。原为四开一中张，后增至二中张。这时，报纸公开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为北伐战争擂鼓助威，为工农运动呐喊叫好，积极宣传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和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四·一二”政变后，它率先提出了“打倒背叛党国残杀工农的蒋逆介石”的革命口号。还与《汉口民国日报》一道，掀起了一个声讨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的革命舆论，站到了反对这伙革命叛徒的前列。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立即胁迫《楚光日报》停刊。《楚光日报》前后共出版约四百期，在党的革命斗争史和革命报刊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革命军日报 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1926年8月创刊于湖南衡阳，十月迁来武汉。主编先是潘汉年，“四·一二”后改为杨贤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副主编黄理文，经理蒋光堂，编辑杨汉辉、熊锦耀、吴玉琪、杨芬、徐文台、李世珍、林汉平、张宝让，副刊编辑高歌、向培良。社址先在武昌粮道街，后迁至汉口生成里107号。正刊四中张，副刊四小张。该报的政治倾向主要受邓演达、郭沫若的影响。因为邓演达除任总政治部主任外，还兼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部长，所以该报不仅报道国内外新闻、军事动态，还经常报道一些有关农民生活以及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对农民土地问题看法的文章，对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湖南“马日事变”发生后，该报在副刊上专门发表了一篇《湖南政变与讨蒋》的文章，主张坚决

镇压。文章说：“此时，武汉方面讨蒋运动的空气似乎很浓厚，倘若没有决心解决湖南问题，铲除这些豪绅代表的小蒋介石，那么我们恐怕南京的大蒋介石尚未铲除，武汉治下的许多小蒋介石——豪绅恶霸以及许克祥等叛徒，倒可以将国民政府推翻了！而且蒋介石可以说：你们讨我，但是你们境内也和我这里一样^{②6}”。这种分析，真是入木三分，打中汪精卫一伙的要害。当汪精卫等借口武汉经济困难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错误的工农政策，提出“先分共，后讨蒋”的口号时，该报又发表社论，驳斥对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诬蔑和攻击，认为武汉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封锁和破坏，“武汉民众要想求生谋活，也只有‘杀到南京去，打倒蒋介石！！’^{②7}”。

因为《革命军日报》反映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革命主张，因而大遭汪精卫一伙的忌恨。“七·一五”事变后，该报于7月28日被勒令停刊。

武汉民报 由湖北省党部与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前敌（第八军）总指挥部合办，是在勒令《正义报》停刊后，利用它的设备于1927年5月20日发刊的^{②8}。原定主编为曾钟圣（中生），张菘年（申甫）由沪来汉后即由张担任。编辑先后有曾钟圣、刘韶清、邵季昂等。副刊名《红光》，由顾仲起主稿。正刊对开二大张，副刊四开一中张。因为编辑者多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报纸的政治倾向总的说来还是进步的。当汪精卫一伙鼓吹既要反蒋又要反共，蓄谋叛变革命时，该报在副刊上发表了叶平的署名文章《谈谈中国革命问题》，严正指出：“最近颇有人提出‘反共反蒋’的口号，他们很想再找一条出路，以维持其政治生命。他们的意思，以为蒋介石公然的反对革命，自然要反对。但共产党做工农

运动太过火了，也一样的要反对。他们不愿意往右边去，也不愿意到左边来，他们想站在中间。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国革命只有两条路，即资本主义的路和非资本主义的路。所以凡是不愿意到左边来的人，虽然在表面上说不往右边去，其结果一定做了反革命。”因此，文章强烈要求：“继续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扶持农工三大政策，积极发展国民政府治下的农工组织，勇敢的惩办一切反革命派，……出师东征和肃清湖南，打倒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许克祥等。”^②很明显，这篇文章不仅与汪精卫、唐生智的想法大相逖庭，而且揭露了他们必然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归宿，因而使汪、唐大为恼怒。“七·一五”政变后，立即勒令该报停刊。

向导（周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后迁至北京、广州，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迁至武汉。在武汉最早编辑发行的是1926年12月5日出版的180期。在汉出版期间，该刊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指导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支持了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在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反对北方军阀鼓吹的“南北妥协，共同反赤”阴谋、揭露与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等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1927年3月12日出版的第191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半部分，驳斥了反动派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诬蔑，回答了党内右倾分子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了湖南和全国的农民革命斗争。《向导》周报后期也发表过一些有错误倾向的文章。虽然如此，它仍是党在大革命这一时期主要的指导性刊物，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大革命历史的宝贵文献。当时的武汉，人们争看《向导》，有时连续四、五版，发行到十万份以上，

仍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7月18日，当汪精卫集团已经叛变、白色恐怖弥漫武汉时，《向导》周报还以战斗的姿态编辑发行了第201期。总计它在武汉共出了二十二期。

群众（周刊） 为中共湖北区委机关刊物，1926年11月1日创刊。编辑及发行处原在武昌黄土坡，后移至汉口后城马路长江书店。主要撰稿人有陈潭秋、李立三、恽代英、罗章龙、林育南、陆沉、蔡以忱、葛季膺、郑超麟以及陈独秀、张国焘等。该刊辟有时事短评、专论、武昌和硚口通讯、群众呼声等专栏，“对于湖北政治经济及民众运动备述无遗”，并根据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见解独到，主张正确。”^⑩它不仅畅销于湖北，也流传于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可谓“‘群众的革命化’和‘革命的群众化’的急先锋。”它也是我们研究当时湖北、武汉地区历史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一些理论、政策问题的重要文献。

武汉星期评论 创刊于北伐军占领武汉前，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成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有董用威、钱介磐、邓初民、张郎先、冼百言、马毓英等。社址设在武昌阅马场旧省议会内。每期发行二万份。

汉声周报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办，主要负责人和撰稿人有宛希俨、詹大悲、谢远定、罗天骥等。

这两个刊物虽然属于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但因主要负责人和撰稿人多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其对于国内政治的评述，对湖北武汉地区一些问题和事件的看法，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态度，都比较正确和客观，推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我们研究武汉国民政府历史，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

料。如当蒋介石已在上海等地屠杀工农、汪精卫一伙在武汉也跃跃欲试时，《汉声周报》特意发表了在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何香凝的《扶助农工的感想》一文，指出：“工农实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要完成国民革命，只有切实扶助农工。……扶助农工就是革命，摧残农工就是反革命，要革命应急速打倒反革命党——摧残农工的分子。”^⑪”这就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并对汪精卫一伙来了个当头棒喝，在当时传诵一时，影响很大。

湖北政府公报 由湖北政务委员会（后为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辑，负责人为麦朝枢。1926年11月29日创刊，每周一期。社址在武昌大朝街。定期公布各种政纲、宣言、命令、法规、公函、公电、咨文、呈文、布告、省市政府会议记录等；

汉口市政周刊 是汉口特别市市政府的公报，负责人及主要撰稿人有詹大悲、杨玉如等。社址设在汉口河街旧督办公署。该刊“除公布市政府之法令、布告、函件、规章等公文外，复拟宣传市政知识、讨论市政问题、报告市政设施、统计市区实况。”

市政周刊 汉口第三特别区（收回后的英租界）市政局公报。定期公布市政局条例、会议记录、市政设施等。负责人为谢保樵。社址在原英租界阜昌街。

这三种公报，对人民群众了解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本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革命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作用很大。是我们研究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历史的重要的原始资料。

一周时事述评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印，1926年12月开始刊行。主要撰稿人有李合林、潘汉年、曾广勋。社址在武昌粮道街。《述评》对国际间发生的大事、北洋军